

第 A-2 場：地方創生與人才培育

主持人：

蘇彩足 教授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主講人：

朱景鵬 教授

歐盟莫內講座教授／東華大學副校長

與談人：

- 謝政諭 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 沈建文 副教授兼主任／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 蔡惠婷 新竹市議員
- 松王淑珍 宜蘭縣議員
- 王威元 理事長／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新北市議員

蘇彩足：



蘇彩足 教授

謝謝，各位貴賓，各位先進，非常感謝大家來蒞臨這個會場，我們這場的主題，是地方創生與人才培育。現在為了節省時間，就不一一介紹，待會等請他們做評論時再來介紹，我是台灣大學的蘇彩足，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學習，我們先請歐盟莫內講座教授，以及東海大學副校長朱景鵬，來為我們進行三十分鐘的主題演講。在剩下三分鐘的時候，會按鈴一聲來提醒，時間到，會按兩聲提醒，現在請副校長。

朱景鵬：

謝謝主持人，蘇老師，謝謝三位的與談人，蔡議員，謝老師，還有沈老師，

今天大會給我的題目是，地方創生跟人才培育。

我今天的報告，大概會分成幾個部分，在前面的部分，跟地方創生的緣起這兩塊，都會以台灣日本的對比，有些資料的來源，他會從既有的已經完成的，跟



他延續規劃構想，日本是怎麼做，台灣怎麼做，因為這些是比較屬於 Public 的資料，我前面大概會先帶過。

第三個部份，我比較會從對我們本土化所帶來的一些挑戰跟思維切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人才培育。在人才培育裡面，大學是一個重點，尤其我自己所處的大學是鄉下地方，這個鄉下的大學，如果規模很小，他要怎麼去帶領地方的火車頭變成地方的智庫。

因為台灣在 2001 年以後，在政策上，是每一個縣市都要設一個大學，但是有的規模很小，所以他的動能到底夠不夠？我大概以我自己的東海大學個案，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這個大概就是我今天要報告的大綱。

首先，先來談一談為甚麼要地方創生？這也不是我發明的一種論述。這個其實也是現在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而且普遍面臨的現象。雖然人口不斷地在增加，不斷地在成長，但是有一些的國家，像日本像台灣都邁入到高齡，甚至是超高齡的社會，有些國家的生育率，非常非常的低，像台灣的生育率，應該是全世界倒數第一，後來我們被稱倒數第一的時候，國發會立刻跳出來說，我們不是倒數第一，是倒數第二，其實第一跟第二，已經沒有甚麼差別，聽說韓國還比我們要低一點，韓國是 0.89，我們是 0.92，就是根本不到一，出生率不到一，所以首先我跟各位來做這樣一個說明。

首先，我們的人口負成長，台灣大概在 2020 年之後，就要進入這種狀況了，高齡化的社會，是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我們台灣會在 2026 年之後，就邁入超高齡的社會，六十五歲的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日本現在已經占百分之二十七了，非常的高，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這部分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聯合國發布目前的人口成長，在全世界今年已經到七十七億了，我記得兩年前，我在東海大學辦了一個講座，請了一個國際的學者來談的時候，那時候還談七十億，講到全球氣候變遷，我們要怎麼樣去吸一口氣，結果，現在已經來到七十七億了。

2011 年會超過一百億，增加到一百零九億，高齡化去年開始，我們看到我們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史上第一次超過五歲以下的人口，2050 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會來到十五億。2050 年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口預估是九十七億，有十五億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

另外，一個低生育率，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請各位來參考，所以整體上來看，這是呈現一個低生育率高齡化的情況，共同面臨的問題，台灣跟日本一樣，都是人口的減少，這個部份我們就不去一一地做說明。

第二個共同的問題，日本的部分，我就不談了，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這塊

地方還蠻大的，因為我在花蓮，我是出生在台東，我在花蓮當副縣長的時候，是2003年到2008年，那時候我當副縣長，我們有三十四七千多萬人口，現在經過幾年之後，剩下三十四萬六千多人，足足減少了兩萬多人。我的故鄉台東二十一萬多，記得我在念高中的時候，是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六人，現在剩下二十一萬多。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台灣也是人口往都市集中的情況非常的嚴重。南投也是，南投這個地方，看到四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其實他在兩年前已經down到五十萬以下了，兩年多以前，他還超過五十二萬，我看到的數據是五十萬，現在剩下四十九萬多，所以這是台灣地方往都市集中化的現象非常厲害，這張圖請各位參考一下。

第三個高齡化日本的部分，也不談了，我談台灣高齡化的老年人口，到去年的時候，是三百四十三萬人，佔比是百分之十四，2020年就是佔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戰後嬰兒潮，我相信在座除了我們的蔡議員，謝老師我就不好意思多談了，蘇老師就更不能講了，所以我們都會面臨到這種情況。

2015年我們會有七百一十五萬人，這是我們的推估，這推估我們就省一點時間。另外我們城鄉發展的失衡，現在都市可能會被消滅的狀況，像日本預計會有八百九十六個町會消失，其中五百二十個人口不到一萬人，我現在覺得我們在談地方制度地方自治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有鄉鎮，我們花蓮有鳳林鎮玉里鎮，人口數就是兩萬三萬以上的，不過我看未來大概都會到一萬，到那個時候，我看就會面臨到消滅的情況出現。



朱景鵬 教授

沈建文 教授

台灣過去五年，就是只有我們的縣治人口成長，其他的都是負成長，這有一點違背當年我們要成為四都五都的想法，因為希望帶動周邊衛星的效應，但是後來好像效應都沒有帶出來，反而吸納了這些人口到這些都市去。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第二個，就是當瞭解這些情形之後，當地方創生是以人為本，我這裡面有提到一個東西，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出來——我中間會畫一個紅點，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重點叫「人才」，日本所提出來的三隻箭當中，其中一枝也是人才，另外兩枝，是「資訊」跟「財政」。

日本的出生率，大概是只有1.4271、4267，是比台灣高多了。我們台灣內政



部最新的 2018 年是 1.06，韓國是 0.98，聯合國給我們 2017 年的數據是 1.21，1.21 的出生率，是全世界倒數第一。

全球出生率最高的，是一個媽媽生了 7.8 個小孩的那個國家，是在非洲地區。所以我們現在的出生人口，我現在講一下東京的人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遷入的有一萬多人，這是 2018 年。那我們在台灣的部分，我們的出生數 2016 年的時候，那是建國百年的時候，建國百年是一個高峰期，出生的小孩子有 22.9 萬人，我以我們大學感覺比較舒服一點，不用擔心大學沒有人來唸。可是到了 2018 年，短短的六年時間，台灣的小孩子出生，只剩下 18.16 萬人，這中間的差距，是差不多將近五萬左右，六年之間，出生少了五萬人，這是基本台灣的一個情況，請各位做一個參考。

接下來日本，各位可以看得出來，我把中間這一欄給框起來，紅色的這是與人有關。所以我說以人為本位的話，包括人才的推動，各位可以看得出來，日本採用的是地方創生許願的方式，或是地方的大學，是其中扮演的角色，這裡面也以談到一些政策的配套，也有一些在地接觸改革的方式，甚至讓孩子去體驗農村的活動，這是日本在地方創生，關於人的部分。

這是第二塊，關於日本在地方創生，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在右手邊這塊，我們的國發會也有一個想法，就是讓公務員認養自己的故鄉，日本在這裡從 2015 年開始調派，到了 2018 年，我們這邊統計總共是調派了 204 個市町村，在這 204 個市町村，國家公務員進駐的，大概也是兩百多，但是國家公務員進駐，還非常非常的有限。

民間的人才到底怎麼樣，這是一非常重要，你要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地方創生的推動的意願，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人才下去就好了，你這個人去，會待多久呢？

在我裡面談到一個具體的指標，就是人如何回流。左邊的框裡面，就是人如何回流，人如何回流這個問題，我們的國發會陳主任，特別在一次的會議裡面，他並不喜歡 KPI 值，如果真要用 KPI 值，所謂的地方創生，就是把人叫回去，那人口的成長，變成是最終的指標。但是關鍵就是人回不去，所以我們要用甚麼方式，讓人才能會回去，讓人才能夠駐足留住，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重要的課題，所以我這邊開始做紀錄，一個企業人才，回鄉人才回流，我們這裡是有一些方式。

這是日本的方式，日本版的「企業故鄉納稅」，我覺得這個地方創生，應該要有一個成套完整的配套方式，比如說你企業要認養故鄉是可以的，我們剛剛已經有一個案例了，但是企業認養故鄉以後，他要養多久，他要怎麼養？政府如何

對他提出稅制的配套？是要減稅？還是要免稅？是要前面五年？還是前面十年讓他來做政府的推手？這個是我認為，是其中可能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此，在這裡面，我就會覺得，台灣的地方創生元年做下來，我們的第三塊這裡，右下角這個人才資源的這個部份，其他的部份我就不談了，因為財政資訊，都是跟日本的地方三箭是一模一樣的，我們跟日本的箭都一樣的，但是這個箭一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考慮，有一個計畫性境內的移居的計畫，一個是境外，境外是涉及到我們自己台灣的移民政策的問題。

第二個是我們自己境內的人才，人才的掌控，我是覺得要考慮要怎麼樣擴大鄉鎮的規模，在既有的鄉鎮底下，去擴大他原有的規模，讓人才願意回去，這是我們在談台灣的人才資源這一塊，這裡面我就覺得應該有一個區域發展的戰略。

我在這裡有一個想法，就是說也是島內移民，首都區的減壓，但是好像越減越大，就是各位剛剛前面看到的趨勢，在這個趨勢裡面，我覺得就是整個缺少一個區域發展的大戰略。

第一個大戰略是，看不到我們真正的育才策略能夠產生甚麼效果。我看到的情形是，人才他育成了之後，他留不下來他能發揮的地方。第二個是，誰才能留在那個地方？這是我問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你要怎麼讓他留在這地方？這是我大哉三問。



所以這裡面，整個看到不管是社會參與科技經濟，我覺得問題都不大。台灣這些人才是濟濟的，但為什麼人才濟濟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去減壓呢？他還是要留在首都的圈子內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我們國發會所射出來的箭，請各位參考。

這是認養創生事業，這裡面有一些誘因，待會兒我們會再談到，這裡面有兩個案例。第一個案例是半導體跨足到魚塢產業，這是在宜蘭蘇澳，這常常被拿出來，地方創生產業投資鄉村的第一期作示範。我們常常做示範，示範之後，示範下連示範都出了問題，這個需要很多的資源跟很多的策略來幫助他。第二個，像美吾髮想要回到屏東東港去回饋自己的鄉村，就設計了一大批明星亮點——就是復刻版的黑鮪魚雕塑。這也是不錯，但是你吸收人潮之後，你還是留不住，人是流動的，但是真正留在那邊，除了創造地方某些就業率以外，接下去的



永續的經營發展才是重點。

第二個，就是社區導入，我要談到基礎環境的結構，這裡面我就提出所謂「四機一發」的概念，到底甚麼是「四機一發」？第一個是「基礎」，第二個是「機會」，第三個是「基地」，第四個是「基金」。這四個東西，你要全方位的在台灣。假設真正的有一個地方創生的學院可以推動，或者是在日本是叫「創生推動局」，他是一個完整的，但是在我們台灣，是散佈在各部會創生的預算之中，像經濟部、教育部等等。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基礎環境」一定要有，第二個要給這些想要回去做地方創生的一個完整的機會，第三個你要給他一個良好的「基地」。這個基地，不管哪個產業，你要看到區域發展的戰略，整個地方適合發展甚麼，然後全力地來支持。第四個是「基金」，至於這個基金要到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來討論，這個是「四機」的概念。第二個就是「一發」的概念，發展甚麼呢？我覺得地方創生，在台灣這麼多的鄉鎮裡面，你要一個一個去帶不容易，那你不如每一個縣市各挑兩個旗艦發展的鄉鎮，這兩個旗艦發展的鄉鎮，可以帶動一些東西回來，比如人也會回來。人一回來以後，他能夠在那裡面，讓地方創生做得有聲有色，然後帶動下一代的人，能夠願意再繼續回來，這是我提出來，所謂「四機一發」的想法。

對於我們國發會現在的想法，我還是覺得錢花出去，人還是回不來，我還是覺得任務結束，人就解散了。這是我們長期看到的，哪怕我們大學端在推動，協助鄉鎮發展各式各樣的計畫，但是最後的結果，會不會計畫結束，人員解散，人還是沒有回來，但是地方他還是繼續要生存，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另外一個方向底下這個部分，人才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重點，我們現在國發會提出來的——公務人員認養故鄉。當然是一件好的方式，但是還是治標不治本。像我們現在最流行講聯合國的SDG，就是所謂創造永續發展的指標十七項，我們大學現在在討論的USR，也是在討論哪個大學要符合幾項SDG標準。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讓公務員認養地方變成一個長時期的、永續性的一種方式。等一下我會來談一些個案，跟各位來分享一下困難的地方。這個困難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我們花蓮，有一個個案的地方叫做瑞穗，我還是覺得我們現在的地方創生，跟過去所謂的社造，跟農村再生恐怕還是有一種延續性的——就是名詞改變了，至於農村有沒有再生，我就不是那麼清楚。但是我是知道社造跟農村再生，跟現在的地方創生是一體的，你可以知道，當一個公務員在那邊，想要有一個更好的發展的時候，他們常常要離開那裏接受調職，又要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花蓮有一個個案，科員跟科長非常有心地用四個月時間跟社區培育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調職了，所以他調職以後，換了一個人來，他有沒有這個心

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覺得推動地方創生的意願，是要非常非常強烈的。我看到最多回到花蓮開了民宿，要不然就是一大堆的咖啡店，年輕人好像回去都做這兩件事。這兩件事不是不好，而是如何讓他能持續下去才最重要。

我們台東我的故鄉還有一個個案，這個個案還得到今年我們國發會的政府服務品質獎、政府創新獎。他的確很用心，人我也看過了，他們還出了書，他的成功的關鍵，是跟產業做了很大的結合，但是他回去的是一個家族，就是說小時候我們看到這個紅藜，都掛在原住民的部落裡面，家裡面的屋簷底下都掛這些東西，沒想到這個東西這麼的好，現在做得好，帶動讓一些人慢慢地就回去了，這個是相對成功的個案。

我是覺得盤點 DNA，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式，我覺得 DNA 的盤點很好，但是我是覺得那個 DNA，跟地方的發展計劃，或者以前我們叫現實中的發展計畫，他每次在談這個東西的時候，大概前面的幾個章節，討論的都是地方不動的東西，所謂不動的東西，就是地理環境啊、產業結構。

暨南大學在九二一地震之後，跟地方的結合是非常非常地密切，也是非常成功的一個學校，就是把生態生活跟生計，做一個完整的結合。我倒是覺得這裏面還是要有一個「自我自願」——就是我們的社區怎麼樣去永續發展。我們花蓮也有一個社區發展得非常的好，最後的時候，這裏面有幾張圖片可以給各位看。

我們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應該是十年長期抗戰工作，不是做一年兩年。就是說長期來看，既然我們國家認為是一件大事，怎麼樣把這件大事當成一件事，組建地方創生大隊，讓參與這個大隊的人，有一個永續地留下來的政策配套和機制，你才有可能讓這一些人留下來。因為你要保障他的就業的環境，我們常常因為就業的穩定性不夠，沒有辦法讓年輕人留在裡面，哪怕是青農。青農他的東西，日後怎樣怎樣，我覺得歐盟他們的制度非常的好，他們的農業是完整的補貼的政策。就是說農民在裡面，本來就是弱勢的，他要提供幾個農產品物價的穩定，而且農產品要提供無虞，而且要高品質的農產品等等，但是他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歐盟的農產品的保證制度在裡面，還有一個輔導制度。所以我把同樣的概念，放在我們的地方創生大隊裡面，要讓大家願意留下來，願意創生工作。一個團隊他不只只是移動的，而且他在移動的時候，是在境內移動，在縣境內移動，在鄉鎮內移動，而不是在更多縣市裡面移動，一串人在移動，他根本人不在那裡。

所以日本的經驗，到最後原來的 KPI 是說人要回來，後來人不回來之後人的 KPI，已經改成「利害關係人口」。所以「利害關係」這個定義就寬廣了，因為你真正要把人定在那裏是難的。我們有很多的文化活動的確是不錯，我是覺得這裏



面應該是有一個產業鏈把他結合起來，這個產業鏈不談選舉，選舉產業鏈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們這些的產業鏈，像大甲媽，問題是大甲媽，是一個年度性的重要慶典活動，他都是在一個小段的時間，如果能把一個小段，一個小段，把他串起來變成全年度的，我們倒是可以去思考，怎麼樣把他串成一個產業。

接下來，地方創生的挑戰，我是覺得有個問題，是誰來發起這個東西，我們是誰來發起，是地方呢？還是中央政府來發起？還是外來發起？這裏面地方政府參與度高不高，鄉鎮的參與度高不高，還有一個你來參與的人認同感高不高，如果你的資源不足，怎麼辦？你又覺得地方鄉鎮政府，他們的視野是不夠的，所以常常要借助大學端，或者要借助於這些專業團隊來協助你，這是他們有的優點有的缺點。

第二個，到底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生計？我倒覺得還是兩個都很重要，生活跟生計的確最重要。最重要的考慮，因為在我們花東地區，在我們鄉下有很多的故事，很多人退休以後，就到那裏去，他是衣食無虞，或者不強調其他，甚至是年紀稍長的。但是年輕人回到那個地方，很自然地就有兩萬多塊的生活跟生計的問題，有的是住在家裡，因為那裏就他的家。但是有些人是外來的，我就認識很多外來的年輕的朋友，年輕的夫妻，小孩已在那邊，他們要經營一家小的餐廳，或者是他們真的有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想做更健康更養生的東西，他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但是他賺的錢真的非常的少。所以這個就是在鄉下裡面，沒有辦法提供他好的生活，跟生計的重要因素。

我覺得鄉鎮存在的意義，這是我們今天要去思考，到底誰是主角問題，我這裡提了幾個過去，我們提到社造的時候，避開了鄉鎮，但現在的地方創生，我們希望從鄉鎮做起。各位可能認為公務員帶領地方翻轉是一件好事，但是公務員怎麼樣帶領地方翻轉？他有多少的能量？而且通常就交給一個科，科裡面就交給一位科員，這怎麼辦呢？第二個問題，是人口的流失，不斷地流失，但是你活化社區的理念是不變。第三個問題，是社區營造誰能夠接受來自鄉鎮公所的指導？要指導的話，可能必須跟資源做一些連結，因此政府常常就是我們在提供資源結束，案子就結束，他也很抱歉說不好意思，沒有預算了，所以這個經費跟創生的關聯差距非常的嚴重。公務員認養去了地方兩年，小孩子的教育怎麼辦？地方的教育資源畢竟較缺乏和都會差別很大。

接下來我就把重點，放到流失的人才。因為台灣高端人才非常的多，台灣引進的人才，跟其他的國家是不能相比的，人才的失衡跟競爭力的下降，這是一個長久留下來普遍的問題，這已經不是今天的問題了，所以全世界都在注意人才的培育問題。



世界人才的競爭，台灣在亞洲的排名是在第二十名，算是很後面的，雖然第二十名是有上升，我們台灣對人才雖然一直努力在做，但是那個是高端的，而我現在講怎麼樣讓高端的人才回到鄉下，我們現在都講鄉下地方創生，所以高端人才回到鄉下，要一個完整的配套，所以我們的人才的流失，是比較的嚴重，現在我們都在講年輕人，年輕人應該要創造他的價值，要創造他在地方活下來的活路，怎麼樣創造價值？怎麼樣創造地方的活路？我都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他工作非常穩定而且永續。我現在才發現，我當初回國的時候很年輕，我是當時東華大學最早設立的時候去的，當時是 F4，現在就老了。當時沒有人，我去的時候是六十幾個人，然後二十幾個老師，所以我們去的時候是完全從零開始的，可是經過了二十年，人有多少時間，在那邊晃二十年。

所以我是覺得讓他真正能夠達到一個具有工作穩定的條件的那種環境，跟能夠讓他永續留在地方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的新陳代謝太慢了，就大學端也是一樣，我們的新陳代謝也慢了，雖然進到大學的老師們，年輕教師年齡是越來越往後，五十歲以上的佔了 54.5 百分比，三十到四十歲的這一端，是我們這裡面最弱的，但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不妨跟地方來做一些配合，就是說以大學的學生跟地方所需要的人才，然後企業跟政府來做，但是我是覺得這裡面，政府真的要做好一個最好的平台，把那個平台拉起來，然後中央跟地方共同的把這些資源挹注下去，然後變成一個完整的配套的國家級的一個計劃，然後讓他們真正的能夠做在這裏面，我們就簽約簽個五年十年都沒有關係，五年十年十五年，他會覺得我在那邊已經生根了，生根以後，才能對地方做甚麼努力，而且我的背後是比較沒有後顧之憂的。我覺得國家的資源，在人才這塊要做得好，都要強化地方的財務的使用跟健全，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最後談到大學推動 USR 的相關的一些個案。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流行講「企業社會責任」，我也不曉得我們台灣的企業社會責任做了哪些，但現在如果要以地方的創生做主的話，台灣除了幾個「都」具有工業區和科學園區之外，最重要在地方扮演一個龍頭角色的人才資料就在大學端。但是我們的大學端，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少子化的問題，我記得我在當副縣長我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環保科學園區做起來，結果沒有想到我們養了十九家廠商，十九家廠商好不容易把它培養進去，後來卻解構了，其實蠻可惜的，就在我們花蓮的鳳林，那時候是在張福興張縣長在的時候，我是在謝深山當縣長的時候作他的副縣長，那個時候籌備起來的一個園區，後來我離開以後，園區就起了其他的變化，我覺得這就是台灣共同的問題，有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永續的發展，或者是地方的執政的治理的思維，跟著這些在轉變。但是我覺得大學的社會責任，跟地方人才的社會責任，這個不應該跟任何的政府的變化有關。USR 是我們其中整個地方創生裡面，大學端可以參與的一種方式。那時候我弄東華的時候，有提了一個 5G 的核心價值，就是「共



伴、共學、共創、共好、共榮」，最後的目標是，希望跟社會來做一個結合。

坦白講，我們現在有一個計劃——每一個國立大學可以設一個附中，我們花蓮有三個國立中學，都想成為「東華附中」，但是教育部說你只能設一個，所以我們就用投票，花蓮高中、花蓮女中都很好，花蓮高中目前進到學校裡面人數最多的，佔的比例每一年大概有 29 個學生從那邊過來的。當時我們希望能做到「共榮」，花中跟花女我們都有老師是校友，所以那個投票的票數非常的接近，他們都希望能夠變成東華附中，但是教育部的政策說你只能有一個，所以我們只能挑一個。我就發現說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大學端已經有一些孩子，已經選擇就近的區域、就近的學校去唸。除了台清交以外，還有就是中央大學。我們另外一個來源就是新北，所以你知道其實人口在這裏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也跟部落合在一起，我常常跟原住民的菁英老師們來分享。我說你們這些都是原住民最重要的菁英，你們有這麼大的機會、這麼好的機會，從國外拿到博士回到部落、回到學校裡面來，也應該好好地讓國家的資源跟你們的 intelligence 能夠進到部落裡面去，因為我們花蓮市比較鄉下，我對這些部落都還蠻注意的，以前我在縣政府服務的時候，每一年都要去跳舞，還要喝小米酒的啦，這是我們的文化，不喝也不行。

你看我們左邊的圖，我們的育成中心，育成了十九家的廠商，我們跟科技來做一些的結合，大家要知道，這些都是跟我們合作的地方的鄉鎮，能夠把它弄下來，我們很慶幸有一些的學生是留了下來。但是有的時候，碰到以前留下來的學生，他們真的想要再進一步下去的時候，常常必須去組一個基金會或者是協會去標政府的案子，這樣他們才能活下去。萬一政府沒有案子，它們怎麼活下去呢？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生根」是很重要，但是「永續」也很重要。這是我前兩天辦的活動，各位知道這裡面，這些老人家加起來有一千歲了。這是我們花蓮非常著名的經典社區，做得非常好的。我們辦的那個活動，讓這些老人家用他們的手去織布織襪，變成一個去日本參加一個素人藝術的國際展，然後得到國際評審團的評審獎，所以當天蕭美琴委員也來了。我現在心裡頭覺得有一點難過的是，我當天雖然叫他們阿公阿嬤，後來發現甚麼時候我也要變成阿公阿嬤了，我叫他們阿公阿嬤很不好意思，應該要叫他們哥哥姐姐，後來要叫他們弟弟妹妹了。後來發現去幫助他們的這些人，年紀也會越來越大，所以我們現在老吾老的那個樣子，也會越來越明顯，可是我真的是看不到甚麼年輕人回來。

所以我最後的結語是，我除了提出「四機一發」的想法外，我也是覺得地方創生某一些層面跟過去長期以來都非常相似，但是我非常擔心的是，我們的錢花完了，但是人沒回來，計畫結束了，人就解散了，這個情況會不會再度出現。

第二個，公務員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的學生台北人，到花蓮去當公務員，考上了然後在那邊工作幾年，他又調回去台北了。最後跟我說老師我回去台北了，現在到內政部，到了哪裡去了，年輕人留不住，這個時候你怎麼辦？你如果今天要讓他回去，除了說它是我的故鄉以外有一點點的情感，你怎麼讓它變成帶頭產業的行政專員？

所以地方創生把對的一個想法，一直在我的腦袋裡面，像日本成立一個地方創生局。但因為我自己處理過組織改造工作，我覺得增加那麼多的單位，或一個專責單位都是我們改造，其中當時也有很多阻礙的地方。但如果你的政策需要落實，不一定要跟著一個機關的成立或結束，而是可以轉型的。所以我是覺得把這裡面的運作，能夠真正的地方創生專員的設置來做努力，也許是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不一定只是在物資回流，而是在我們的生育政策是真的有問題。憑甚麼我們的六都寶寶，跟非六都寶寶價碼是不一樣？只是因為我們比較窮。政府的政策裡面一樣，這種國家人口政策，在各國裡面都是要放在最高的。梅克爾現在她的政策非常的清楚：每一個孩子一出生，一個小孩領多少錢，兩個小孩領多少錢，三個小孩領多少錢，非常的清楚，不只有孩子的錢，還有父母親的錢。奧地利的歐班政府，最近才拋出最新的一個兩件，第一件我就不講，第二件是你結了婚以後，你要跟銀行貸款買的房子貸款一千萬，你只要生了孩子，第一胎就給你三分之一的補助，第二胎給你三分之二的補助，第三胎你生完了，政府通通幫你付了。所以他們的結婚率提升了37.8%，生育率還不知道，讓我們覺得應該要下重手，而不是幾千萬拿去做甚麼、幾千億拿去做甚麼，這些東西才是未來人口紅利的來源啊！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蘇彩足：

非常感謝朱副校長非常精彩的演講，接下來，我們要請我們五位的與談人，每個人就剩下的時間，每人可以使用七分鐘。在五分鐘剩下兩分鐘的時候，我就會按鈴，我想請大家把握時間，才不會影響到下一個場次，我想就根據大會給我的與談人的順序，首先，先請謝教授，再請沈教授，然後蔡議員，然後松王議員，最後是王議員。現在就先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的謝政諭謝教授。

謝政諭：

主持人，主講人，各位與談人，各位在場的貴賓。朱教授這麼精采的演說，真的想再繼續聽下去，因為我也想退休了，就想回鄉下去，現在正在蓋房子，雖然沒有辦法創生，至少在那邊消費。從剛剛那麼精采的報告裡面，可以說是無懈可擊，完美無缺，沒有辦法提出太多的東西，只好雞蛋裡面挑骨頭，有幾個問題跟朱教授請教，跟與會的人一起來探討。你最後有提到日本有地方創生推動局，

你自己又負責過政府的改造，那日本的這個創生局，他的成效如何？我們的政府好像對社會的變遷行政的配套，永遠趕不上，那怎麼辦？我自己的感受，我的老家在雲林鄉下的地方，相當的貧困，幾十年都是這個樣子。

日本這個問題很嚴重，像這個禮拜我才從東京回來，幾年前我到過九州的大分那個地方，窮的不得了。舉個例子，那個地方有兩百年的大的文學家畫家，也整治的不錯，可是一天，我在那裡待了大概至少兩個多小時，一天包括我只有三四個遊客，那這樣的狀況可能實在是很多的國家都一樣，過度的都市化，像東京是擁擠的不得了，但是離開東京，包括像奈良這個地方都蕭條，這個怎麼辦？這個我們現在叫地方創生，過去叫社區營造，似乎可以看到現在的政府很強調創生，換了一個政府以後，又有一個口號出來了，好像永遠沒有把問題徹底地解決，然後又花了一些好像不太有效率的預算。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想要進一步請教的是：這個育才的策略是很關鍵，我們在座有很多都在大學裡面，可是我們總是覺得我們的學生在學校所學的東西要拿到地方創生的這些產業去，似乎有一段距離，從教育上就培養人才的部分就已經有一點斷層，有可能用甚麼樣的社會教育來再造人才？同樣的企業認養，或者是說剛剛朱教授所提到的

成功的案例，像美吾髮等等，似乎都停留在一個點的成功。這個點的成功，能不能形成一條線形成一個面，點的成功如何推到線推到面，這是我困惑的事情。日本所謂的三箭，我們似乎有一點抄襲，但是我總覺得說在地方上不見得要有那麼多的資訊，當然資訊包括很多的部分，不光電腦 AI 等等，但是地方更重要的是「生產技術」。就像五十年前，我的老師楊茂村，他們在農村推廣鄉村社會學，在大陸時代就一直在做這個事情，然後四健會，然後我們看到地方農會農村有一段時間真的是繁榮起來，可是現在政府似乎在整體上怎麼樣達成地方創生都斷了一個鏈，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可能都停留在很少的幾個點可以成功，或者是說比較亮麗起來。我們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地方讓願意回去的年輕人他有未來，然後他也感受到教育文化在那裡也有那個資源，然後產業有機會，未來的下一代也有跟都會享受一樣的教育。我就聯想到三十幾年前，李國鼎在推動一個衛生到鄉村裡面去，鼓勵當時陽明畢業的醫生下鄉，然後他可以抽成。這種狀況有他的成功面然後帶動地方，至少我現在看到當年回去的，服務幾年後他其實可以回來都會，但他也不回來了，他就在那裡安家立業，然後變成非常多老人都圍繞著他，然後

覺得這個醫生是他們後半生的照顧者，這些東西政府應該有一個較完整的配套。

公務人員下鄉，或者是大陸的大學去認養偏遠地區，這種狀況目前實施的怎麼樣？因為我們的朱教授在中央跟地方都待過，像花蓮因為朱教授的關係，在台灣所有的農村的縣市裡面是最好的一縣，幾十年來是花蓮之光，一個朱教授就可以抵過多少人。你的這些成功的經驗，能夠把他推到我們很窮的，比如像雲林、澎湖等等這些地方，讓地方的人員、地方的官員也知道說其實他背後還非常多可以開發的空間，我想我能想到的先到這裡。

蘇彩足：

時間很精準，時間控制得很好，我學預算的，時間是最稀少的預算之一，接著我們請沈建文教授，他是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的主任。

沈建文：



謝謝朱教授精彩的分享，還有蘇教授的主持。當然做任何事情，我是覺得最重要的是動機，我覺得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該要傾聽這些年輕人，他們如果要回去的話，他們的動機是甚麼？甚麼樣的incentive 才會讓他們想回去？我們有沒有做過這樣子的研究？還是我們做的這些政策都是我們自己想的？也就是從我們的角度來

制訂政策。我自己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如果你要叫年輕人回去的話，他們要的是甚麼？我們都假設我們以為知道，以為我們都走過這樣子的路程，好像應該知道，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世代都有他們不一樣的想法。我覺得現在他們年輕的世代，他們可能更重視他們自我價值的實現。有一部份人他們可能不見得是以賺錢或賺大錢為目標，他會想要做些改變，讓他的生活有一些更多不一樣的面相，他想的是去創造價值、創造理想，而不見得是最大化利潤為主。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在這邊推動社會企業的一個想法，其實也是覺得社會企業他最大的目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在想怎麼樣去創造最大的價值。如果地方創生和所謂的人才培育的部分能夠更重視這一點的話，讓年輕人他們在做人生抉擇的時候，我們可以跟他講：「你有這樣的 option。」我們國家的人才政策制訂或者是政策制定會有不同的面相，但是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回去。我覺得「人盡其才」是很重要的，如果有這樣子價值理念的人，我們是不是可以提



供更多的資源去做這件事情呢？所以那個 incentive 就是他的人生目標是要創造社會價值，我們要提供他怎麼樣的 incentive，讓他可以在這樣一個地方落地，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價值。因為在地方創生來講，經濟面固然重要，但這方面我不太認為他可以創造很大的像台積電這樣很大的經濟規模，反而要看他在另外一個社會價值面的估計。所以我們在政策制定面來講，我們不能一直光看經濟面，實際上他的永續發展目標有很多的面相，那其他的面相不見得會是以產值來看，其他的面相可能會是以扶植來看，我創造多少的扶植，我創造多少所謂安定的感覺，創造多少所謂族群的融合，這個部分來講都是我覺得在地方創生可以重視的部分。我在中大有個 USR 計畫，這個 USR 計畫，我們負責的是在沿海地區復興，其實桃園所有的區都還算人口膨脹，但是他們還是碰到很大的問題，就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還是會往都市發展。我自己有兩個中心，其中一個中心有三個職員是從新屋來的，也就是說他們在地方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所以他們必須要到中壢區或桃園區工作。所以在我們的計畫裡面，很重要的就是怎麼樣去培養地方社會企業的團隊，我不會去強調你一定要賺大錢，賺大錢可能不是我們創生團隊的重點，反而是要讓一些有不同理念的人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是我們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我自己的一些相關想法。

當然剛剛朱教授有提到「品牌」，有關品牌建立的事情，我覺得台灣一直缺乏一個有系統性的構思。甚麼叫做「品牌建立」？我覺得「品牌建立」，我的品牌跟你的品牌當然有不一樣的賣點，那我的賣點在哪裡？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是，每一個地方應該要長期的去找出每個地方的亮點，他的優勢在甚麼地方，就是說你一個東西不太可能做一兩年，他就會變成可以永續發展的東西。而應該是說，如果我在這個地方投入一個十年的計畫，這十年的計畫看有沒有辦法產生出相關的亮點，這樣子品牌才能夠建立。然後我覺得我們過度地去強調內地市場的開發，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事。因為我們有少子化的問題，如果我們在一個市場上我們顧客的客源都比較重視本土的客源的話，行銷部分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的吸引更多國外的觀光客或是國外的顧客群來到我們這些地方，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你要讓國外的人，花那麼多的錢來到台灣還跑到鄉鎮去，你就必須有足夠的誘因去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那個行銷的力道在哪裡？我們一定需要掌握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城鎮它的一個特色，而且我覺得，我們一定要長期的去耕耘，不要很多地方都有一點像拷貝方式，去拷貝大家成功的商業模式。我覺得每一個地方，要長期去把那一個地方社區的特色給發展出來。但也不可能所有的社區都能找得到亮點，我必須要這樣子講，有些社區發展，他可能就是這個樣子。但是台灣每一個社區，他至少應該有我們台灣的自己的亮點，比如說在十幾年前我去斯里蘭卡，我就發現光他們這個迎佛牙的儀式，其實每年在聯合國的世界遺產都可以找得到很多的英文的資訊。台灣有關的英文的資訊最近幾年也

慢慢地有做起來，這個部份其實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去努力，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謝謝！

蘇彩足：

謝謝沈主任的報告，跟前面兩位的老師的一樣精采，接下來，我們要請新竹市的蔡惠婷蔡議員。

蔡惠婷：

你好，謝謝大家，今天在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分享，就我上任一年在地方上的觀察，還有我過去在教育現場十年的經驗，我希望從地方的觀察跟教育的現場來談起。



剛剛聽完朱副校長的分享，我很有感覺，因為我以前在台東讀書，我非常喜歡台東。我發現朱教授他非常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麼樣的把人留下來，我覺得年輕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像我們這種成家立業生小孩的人，基本上要再更動是非常難，所以我覺得最有機會潛在的人才培育，就是在我們的年輕人，所以青年參與非常重要，

尤其是學生剛出社會工作，他的變動性還是非常的有彈性有機會的。可是為什麼到了地方那個計劃一直在推，可是人還是留不住呢？從我在地方上看到的可以提供我看到的困境。

第一個，其實在地方的鄉鎮公所之外，還有一個最接地氣的是里長。里長他們跟地方的連結，跟里民的連結，還有社區發展協會，都是最接地氣的。可是公部門有他們的科層體制，非常難以變動。所以變成說有的時候，公部門要推，可是鄰里長有他們在地的文化勢力或者是長久以來的習慣，其實要去推動是不容易的。這中間他們會有一些抗拒，公部門也會有一些抗拒。在這部分我認為，如果有一個仲介者的專業代理人才，比如說像我們新竹市，這幾年的社規師他們做社區營造，他們的能量慢慢地起來了，他們就可以透過社規師去做一個仲介的橋梁。前幾天我跟我們新竹市一個社規師聊天，他告訴我說：「我發現我這幾年在做這件事情，這個行業是可以當飯吃的，他是可以養活我的。」所以代表說，這個工作帶給他經濟穩定，讓他可以持續地在這個領域上耕耘，那我認為這樣子才能繼續長久地永續走下去，經驗也是會奠基的。



第二個，怎麼樣在公部門當中適時地賦權給年輕的公務員。在公部門科層體制中，它的長幼思想是比較重的。有一些年輕的公務員，他是有創新更改的動能，但是因為他們的層級位階的情況，或者是有一些調動——我認識一些科長，他本來有一些承辦的計畫，但是因為他的行政長官調動以後就斷層了；或者是像我們的東區的區公所，辦了參與式預算的規畫，好不容易有一點成果之後又被調走了，就要一切重來了。所以這個計畫的持續性跟人才怎麼留住是公部門要去思考的課題，好不容易累積一點的成果常常就被卡掉了，是非常可惜的。

再來，我之前有參與過的審議式民主的培訓。我認為審議式民主跟參與式民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們新竹市的東區有在推這個部份，我認為這個需要全民參與，因為像我們辦過一次參與式預算的論壇，沒想到來的最多的是長輩，沒有想到長輩來的比年輕人還多。我就發現現在年輕人對於這個社會參與的意願，或者是在當地在地的參與的意願是如何？也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還有剛剛謝教授提到的在教育上的斷層，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國小的老師，我當了十年的老師，我剛剛想到說地方創生除了結合產業的發展之外，也可以結合學校的教育，像日本剛剛有說到讓孩子體驗農村。如果說學校可以走出到社區，比如說我們學校新竹市有學校是實農教育，如果學校教育結合地方創生，每一年學校都在連結的話，讓孩子從小就可以連結到在地的地方創生。那個東西就像基因一樣，像種子會種在孩子的心中，我相信在他這個童年的教育經驗當中到他長大之後，這個東西有可能在他某個階段發酵，不管是他是留在自己的故鄉，或是他外出求學之後留在他鄉，他鄉久了就變成故鄉，我認為這個東西對於永續發展的紮根是重要的。所以我認為地方創生不只是結合產業發展，還有教育單位，尤其國小我認為像幼兒園都可以去做，把它跟社區做更多的連結。

我覺得回到地方創生，甚至教育整個核心，就是人為什麼會願意留下來？其實是因為在地情感的連結，或者是在這裡經驗的奠基，讓他在這裡找到一個歸屬感。怎麼樣建去立人跟人的關係？我覺得那個東西不是一個政策一推馬上就能推的，包括了前置作業的溝通、不同生命經驗的碰撞跟理解、然後怎麼樣帶領大家共好共榮，我認為那個過程是要更細膩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人才培育，有在地的做這些事情把他永續的推出去。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認為可以從社造社規的這一個行業——因為我在新竹看過這樣的一個課。政府的話就是推資源跟政策，年輕人就是動力跟創新社區，社區在地就是他們的文化跟經驗。如果這三個可以變成一個鐵三角連結在一起，我相信這個地方創生是可以走得很長遠，而且可以非常地穩固，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分享，謝謝！

蘇彩足：

非常謝謝黃議員一些實務性的觀察。接下來，我們要來歡迎來自宜蘭縣的松王淑貞議員。

松王淑貞：



大家好，我想剛剛聽到朱教授談，因為你跟部落有連結，我本身是北泰族，爸爸是北京人，媽媽是泰雅族。我是來自宜蘭縣南澳鄉，我過去是立法委員的國會助理，我生根地方八年了，三十個原鄉，包括一些平地的部落。

自從我去年上任以來這段時間，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人才培育的部分。因為我們

們宜蘭縣有三個鄉鎮：蘇澳、大同鄉跟南澳鄉，我們是可以推地方創生，所以說我一上任的時候，我積極地跟縣府來爭取原民教育中心，所以我們明年的二月就要正式掛牌了，因為這個很重要，我們必須要建構屬於我們原住民自己的教育體系，不管是從幼兒到高中十二年國教—當然未來我們也會想說還是需要大學—至少我們在這個教育中心希望培養的是文化的人才。現在主流的整個課綱設計的並沒有 for 我們原住民，通常 Who am I 這個部份，尤其我們看到現在，看到國中高中的孩子，已經都不知道他們自己是誰了，所以我非常的憂心。我們有一個完全中學，所以我們也跟教育處處長跟校長來談。對我們整個文化傳承的部分，我想地方創生很重要的我們站立的自己的特色，知道我們是原住民，是泰雅族，所以我們一定要去保有我們自己幾千年來的文化，包括我們有很豐富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這一次我們的地方創生，過去我們有提過泰雅文化園區，這次還要重新地去復振它。

另外在教育的部分，像常常我最近一直在大聲疾呼：我們一定要重視自己的教育—我是在講我們原住民自己的教育。可是很多的家長會問我說，這個出去有飯吃嗎？我們現在的主流是升學主義啊！所以我們怎麼樣在這個看似主流的社會底下想，我們的劣勢是要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優勢。比如說，我們原住民狩獵很強，如果把大家放到山上去放生，大概活不過一天兩天了。就像我有一次在十三行博物館辦一個活動，有一個人類學的教授就跟我說：「上帝好像把那個 GPS 放到你們的腦袋裡面了，你們居然到山上都不會迷路。」我說：「對喔！我們好像都是天生的。」所以說怎麼樣把這個劣勢變成優勢，優勢變成一個競爭力。其實我們所有的年輕人根本都不想要去外面，除了要讀書沒有辦法，出國深造等等，



但是每一個人都很想要留在自己的地方。但是像我們南澳這幾年，除了有一個蘇花改有一些工程創造一些工作機會，現在又結束了，可能還有一些像甚麼消防自衛隊啊甚麼的，或者是行控中心等等，但是難道我們就只有這樣的一個工作選擇嗎？所以地方創生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培育我們自己在地的人才。我上任之後，跟教育處長還有當地的校長就來談說，我們要來辦技職教育，這個技職教育要符合未來我們地方創生的需要。我們南澳就是像我以前小時候暑假的時候，每一年我都很喜歡回去，為什麼？因為阿公阿嬤家那裡有種稻種花生養雞鴨甚麼的，自給自足，所以我很喜歡去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要辦農業班。我們從國中有一個職涯探索，到高中農業班，還不要讓它只是高中畢業，我們會讓他們對接到大學前三年的一個農業專班，讓他們至少有一個大學的文憑，但是寒暑假時——像司馬庫斯有一個很成功的案例：他們禮拜五的時候，所有的孩子都回去，而他們在外面所有的生活費都是部落經濟產業賺的錢，用這些錢去扶植這些小孩子，禮拜五禮拜六他們就在那邊貢獻他們的所長，也是很好的一個職業實習的場域，包括設計班。我們真的都是天生，都不用去學，甚麼插花自然就很會插花、很會彈琴，包括我們天生的幽默，像我現在就覺得自己太嚴肅了，我一直在學我們原住民的幽默感，像我們心情不好時就會說：「是不是心情不美麗了？」所以說像表演藝術、公共事務人才，還有長照班等等，這都是我們在未來要積極培育的。

我們的核心、我們重要的公共事務議題都在部落會議來討論，所以我們在部落會議中去訓練大家怎麼樣在會議中發表自己的意見，然後你可以去表達：「我想要的部落是甚麼？我未來的生活是甚麼？我想要用甚麼來生活賺錢？」我想這個都是很實際的、接地氣的。在這個部份，我也一直很積極地跟縣政府去溝通，不管是從聯合國的原住民宣言，還有憲法、原基法賦予我們的權益，讓他們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權益，包括預算的爭取。像我們的教育處說，依法你要有 1.9% 的預算，像這次他們編到 5.4%。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能夠開始去落實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謝謝！

王威元：

謝謝蘇教授，謝謝朱副校長，謝謝謝教授，沈主任還有我們的蔡議員，松王議員還有在座的貴賓，大家好！

我想要談這個地方創生跟人才培育，我們先討論「創生」這兩個字。其實創生是 2014 年開始從日本發想的。日本所謂的「創生」，他的涵義在於「創造生命力、生活力」，雖然這個「創生」在日本一部份的想法是要紓解因為城市化所帶來的超高人口密度的居住環境，但是事實他「創生」的內容跟內涵，並不僅限於



所謂我們口中的「偏鄉」。其實 2016 年的時候，我們政大的白仁德教授到東京橫濱等等地方去參訪，他提出了一個比較近距離的觀察：日本的創生並不僅僅侷限於偏鄉，甚至在東京都裡面也在進行「創生」的運動，只是具體表現出來的可能是我們口中的「都市更新」。在日本人的眼中，這也是創生的一環。我來舉個例子，在日本有東京車站，他本來容積是 900，為了要做創生，他們就把它提升到 1300—就是說一坪的土地，基本上可以蓋到十三坪。我們台北市是 225，人家是 1300，我想這也是值得大家去探討的一個問題，包括六本木。六本木現在幾乎是全世界非常多觀光客都喜歡去參觀的地方，它也是全日本地方創生非常有名實際的例子，像剛剛有人講的一樣，前期的碰撞跟溝通理解，



他們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在做溝通跟計畫的延誤，然後跟在地的原始居民了解，然後最後真正施工是整整十七年時間。它們地方創生都市更新之後，以全世界做為他們的市場，我們世界各國的人都到六本木去觀光去遊覽。還有我要提一個是橫濱，橫濱它地方創生的都市計畫裏面的商業區佔了 45% 以上。我們台灣大家都不要商業區，大家都要住宅區—把市場放在全世界，還是把它鎖在自己的小地方，這是觀念上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再過來，我要講到為什麼日本講到「創生」，是為了紓解高密度人口。我以一位在新北市擔任議員的角度來看，我在這一期的總質詢的時候就跟市長分享這個概念：我們難道真的叫做「高密度」嗎？如何來定義「高密度」，人家日本東京都整個都大概是一千三百萬的人口，如果單純討論它的都會區，不是東京都區部是大概九百萬的人口，那人口密度東京是一平方公里 2600 人，在東京都區部是一平方公里 14,721 人。

我跟大家提供一個新北市的數據，我們整個新北市是一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 1,942 人，差了將近快一倍。我們在都會區—所謂的都會區就是以溪南溪北，我們的七大區域計畫，溪南溪北的區計畫當中，也就是現在大家熟悉的，人口二十萬以上的區，及比如說像板橋、新莊、三重、蘆洲、中永和這六個地方—加起來我們的人口密度是 9,400 人。我想提醒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人口密度遠遠低於東京，低於其他的國際大都市，所以我覺得我們還不算是太高密度的城市。我再提醒我們的市長，我們為什麼要升格？從台北縣時代各鄉鎮市—就像我們朱副校長剛剛提到的，各鄉鎮市都有鄉鎮市公所的時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提升到新



北市的高度？就是我們要透過打破所謂行政區的人文疆界的限制。我們應該用自然疆界去考慮很多的事情，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溪南溪北的這個都市計劃區，這些我們人口密度相對高的都會區，我們也需要廣大綠地及可供呼吸的區域，也就是我們把新北市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的時候，我們的地方創生可能顯得更加有意義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把地方創生的主軸放在如何讓人口密度較低的偏鄉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像剛剛講的「有生計有生活」，或許我們換另一個角度思考，不要用整個行政疆界的劃分，而是用自然疆界的劃分，也就是我們不管從事甚麼行業，我們都希望它是一個有尊嚴的所得，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不管你是在城市裡面當一個白領階級，或是在相對偏鄉的地方做木工，還是做咖啡廳或者是做觀光導覽，不管是甚麼樣的行業，我們都希望是有尊嚴的所得。所謂的「有尊嚴的所得」畢竟不能持平而論，因為每一個地方的生活水準並不一定相同，但是我們希望在他居住的環境中都能夠很有尊嚴的活下去，我想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環。

再來講到人才培育，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次辦理這樣的一個活動，也是一種人才的培育。因為我們這一次邀請了很多的新科的議員，不管是松王議員、蔡議員也好，還有我本人也一樣，本來缺席的劉美芳議員，她第一次當選的時候也才三十二歲，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人才培育的過程。所以在威元的看法，在我們榮譽理事長六任的議員，然後理事長交接給我，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的人才的培育。包括我們這一次主辦的活動，其實也是一種「地方創生」，因為我們把國際的會議舉辦到台北市，第一天論壇在台北市，第二天的城市參訪在新北市，也促進了我們地方的發展。今天很高興大家一起來參與我們的論壇，希望我們兩年後有機會把活動再爭取回來台灣，或許希望就把主場次論壇放在我們新北市或其他地方。祝福大家，感謝大家！

蘇彩足：

謝謝！王議員也是這次活動的主人，為我們做了一個很棒的報告。後面的貴賓，有沒有人想請教他們的？最後還是要回到我們的主講人，來做一個總結，最後的時間我就交給副校長。

朱景鵬：

我想大概還剩下兩三分鐘，特別謝謝幾位，也要特別謝謝王議員搭建這個平台讓大家能夠來討論。你剛剛最後的發言，我覺得可以解答大家很多的問題。我心裡面也要講這個問題的時候負擔會比較重，會想說政策怎麼樣持續下去，但如果按照王議員的說法，我們可以放輕鬆一點，因為人才是非常多元的，在任何一

個平台都有可能，只是我們要搭建這種從日本的「地方創生」一直到我們現在國家級的「地方創生計畫」，還有希望人回到鄉下的「人才回鄉」這樣子的總體戰術思維，我覺得認知上還是有差距的。

我的認知是應該要讓人才回到鄉下去。我自己的經驗是當初我們台東當時沒有大學只有台東師專，我唸完書回來剛好是東華大學剛剛成立，我第一個志願是回到鄉下，為什麼我第一個志願要回到鄉下，是因為跟我生長的地方是有關係的。這就回到動機，我到現在為止還是認為那是一個好地方，但是每一個人想法是不同的，所以這兩個想法是有落差。我如果從王議員的角度來看，我的心情是輕鬆的，因為我們培育人才是多方的，我們部落的人才也是多方的，一個工程結束，我們讓做工程的人有機會在這裡能夠在地方待上五年十年的時間，但是歸結到最後就是一個問題，怎麼樣的落地生根？我們就回到沈老師剛剛的議題：怎麼樣才能夠落地生根？我為什麼要強調「四基一發」的概念，就是能夠讓自己有一個創生大隊。回到謝老師剛剛有一個點，就是日本的地方創生局的推動效果到底好不好？日本原來也是希望不要讓鄉鎮一直消滅下去，不要讓人一直地流失，東京的人口一直在遷入，外面的人口一直在流失，所以大家的想法是，這樣我們國發會的出發點也是這樣，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順著國發會的出發點再想一想怎麼樣能夠把人留下來？所以我是覺得剛剛提到的一點非常的重要，就是 CSI，我們叫做「社會貢獻指數」。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設定幾個條件來爭取真的有人願意回到地方創生，組建一個地方創生的人才團隊。我們現在用國發會兩百多個鄉鎮區域去做發想好了：每一個地方鄉鎮去組建一個地方創生的大隊，但是企畫團隊都要是年輕人，年輕人都要在三十五歲以下，你們去組一個團隊，但是政府給你一個很好的 backup，做你們的後台，那你們要提出好的企畫，要有「落地生根」的計畫，「落地生根」的計畫背後有能夠支撐他們的計畫內容和政府的配套措施，包含 funding，所以這個東西我認為應該慢慢去發想。我去看過福州大學，福州大學有一個晉江校區，原來有個海洋學院，現在移到了晉江校區。他們晉江就是很擔心年輕的人口消失，老人人口增加，結果他們就計畫性地將福州大學的海洋學院的學生分年分年的將它拉到晉江校區，最多還拉到五千人，但是它怎麼提供一個很好的 incentive？甚至提供這些孩子們在這邊念書四年都免費？這個錢從哪裡來？從學校從政府資源過去，否則它那邊老化的情況非常地嚴重，所以這是一個我十月才剛剛看到的案例。

至於其他國際上的經驗，育才的策略或者是人才下鄉，我覺得人才下鄉的確跟老師剛剛講的，以前我們的確是甚麼都沒有，就是有一個未來，現在是甚麼都沒有就是看不到未來，這是最好的寫照，這是兩種極為強烈的寫照，所以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時候，你要他回到鄉下去，他就只有陪爸爸媽媽——就像我剛剛提到的到花蓮去，就爸爸媽媽留下的房子就給你開 AirB&B、開咖啡廳，那現在陸客也

減少了，但這個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方式，所以我認為整個結構上，還是有一個極限。

所以我總合以上來看，日本的經驗他的最高理想，目標不就是東京遷入減少六萬，遷出增加四萬，這就是他們原來在推動的想法，然後 2026 年的出生率能夠到 1.8。我們現在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人才培育裡面應該把小孩子的人才給生出來，然後好好教他養他，等到長大以後就留在鄉下就好了，為甚麼？因為我們希望所有的資源都留在鄉下發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來思考的，謝謝大家！

蘇彩足：

這麼短的時間，大家都能提出這麼多有智慧的看法，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總結的會議，我們會把各位的意見帶到會議上跟大家分享。謝謝大家！